

# 在斯坦福讨论写本的日子

范慕尤

在去斯坦福访学之前，我就听说斯坦福有个美丽的大湖，湖畔风景优美，常有人沿湖跑步。因此我一到斯坦福就去找那个大湖。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问才知道加州连年干旱，湖被晒干了，现在只有一个大坑。虽然湖晒干了，但校园内芳草如茵，绿树成荫。到了斯坦福一段时间以后，我注意到草地中埋有水管，定期喷灌，水柱交错纵横，在阳光照射下如彩虹一般，煞是好看。高处的树木也有水车定期浇水。原来这满眼青绿背后所费不菲。无怪乎一位老师说私立名校的豪奢有两个标志，其一是小班上课；其二就是大量的绿植，特别是在加州这样干旱的地方，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清风朗月固然无价，花草树木有时却是有的。

我在斯坦福最常去的是东亚图书馆。说来也巧，本来我所在的研究中心没有访问学者的办公室，但是恰好那时东亚图书馆有几个办公室预留给访问学者，在我的合作教授的帮助下，我很幸运地申请到了一间二楼的办公室。东亚馆的中文和日文资料都很齐全，只是大部分日文书都在地下一层的书库。还记得炎炎夏日我去书库找几本日文书，当时整个书库只有我一个人，空荡荡的，空调温度又低，我冷得直哆嗦。我按照网上查到的信息找到了书籍所在的书架，可是几个书架架在一起。这些书架下有滑轮，转动书架外侧的轮盘就可以移动。每次转轮盘我都觉得自己像掌舵的水手。

在一楼中文的佛教研究区域，我还惊讶地发现了自己的专著。说惊讶是因为我书中研究的梵文贝叶经是很冷门的，而且涉及大量梵文和藏文的文献对勘，即使是研究佛教的专业人员也是有一定的阅读门槛的。我后来和馆长说起这件事，他颇有几分骄傲地说他们的馆员都是东亚研究的博士，选书的眼光是很专业的，哪怕是再冷门小众的学术书，只要有研究价值

他们都会选购。

从我办公室的小窗望出去可以看到高耸的胡佛塔。我对它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两蒋日记就保存在这里。据说日记不能拍照、复印，只能手抄。国内以研究《蒋介石日记》著称的学者杨天石当年就在这里手抄过整部日记。塔的地上一层是纪念胡佛生平的展览。以前我对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前一任总统，因应对经济危机不力在竞选中败给了罗斯福。看过他的生平展览，我才知道原来他还与中国很有渊源。他当年曾任开滦煤矿的工程师，在中国期间他和他的夫人都学了中文。更有趣的是他当上总统以后，有时和夫人谈到一些私密的话题，为防泄密就用中文聊天。这恐怕是美国历史上中文最好的总统夫妇了。

从一层的电梯可以直接上到塔顶的观景台，俯瞰整个斯坦福。蓝色的天幕下一片红顶绿树，建筑物的排布如棋盘一般，纵横有序。站在观景台的窗边，耳畔的风声让人想起斯坦福的校训“自由之风劲吹”。

另一个我常去的地方就是上课的教学楼——麦克拉克奇大楼 (McClatchy Hall)，位于东亚馆的右侧。我旁听的一门本科生的通识课《佛教史导论》在这里上课。一开始我挺不适应上课的氛围。因为美国学生在课堂上都很随意，几乎没几个人是端正坐着的，一眼看过去东倒西歪一片。他们还时常在

老师讲课时提各种天马行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有点不太礼貌，还会影响我抄笔记。不过后来了解到美国学校的风格向来如此，学生不需要正襟危坐，不需要规矩矩地听讲、抄笔记，老师也很鼓励学生随时提问。渐渐习惯以后我也试着代入老师的角色，发现学生们提的问题都很有挑战性，短时间内很难做出清楚明确的答复。这种教学方式其实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学生们开阔的眼界和活跃的思维也让我深受启发，真正的教学相长就是如此吧。

麦克拉克奇大楼是典型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红顶黄墙，和加州的灿烂阳光相得益彰。它的一层有一圈长长的回廊，把它和其他教学楼连在一起。回廊拐角处和中间都有高大的拱门，拱门两侧有圆柱装饰，顶部则是雕刻细致的拱券。走在回廊上，常常会有拱门内遍植棕榈、桉树等热带植物，也有月季、天堂鸟等颜色艳丽花卉，还有各种不知名目的鸟雀，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似乎身处《权力的游戏》里的多恩皇官。巧合的是多恩皇官的取景地就是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皇官，怪不得景致风物有相似之处。

我所在的佛学研究中心离麦克拉克奇大楼不远，坐落于四方院 (Main Quad) 左侧。它就像斯坦福的大多数人文学科一样，小而精。虽然只有两

名教授，但都是各自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中心虽小，但五脏俱全。除了老师们的办公室以外，一楼有茶水间和复印室，二楼有可容纳二十人的小会议室。中心的小型讲座或是讨论会一般都设在这里。

记得有一次中心邀请了普林斯顿的教授，著名的汉学家太史文 (Stephan Teiser) 主持系列的读书会。他是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专家，那段时间刚好在做敦煌发愿文的研究，就带着大家一起读发愿文。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类文献。虽然我本科是中文系，又做了多年的佛教文献，读起来依然很费力，就像当初看《祖堂集》，古人的口语词和大白话对于我们却是难以理解的。“令人不见古时月”，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古文书中却记录了当时人的真实生活和所思所想。当我们群策群力解读出一段完整的内容时，就好像和古人对话一般，那种兴奋和成就感是难以言喻的。

佛教中心的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研究生。除了两个美国人，其他几人来自加拿大、韩国和中国。当时中心的何离巽 (Paul Harrison) 教授刚好在研究一部阿富汗巴米扬出土的写本，就我和研究生们一起上写本阅读课。虽然我读博士时也做过写本，但当时做的是一个晚期写本，原藏于西藏夏鲁寺，时间在十一、十二世纪，以尼泊尔钩体写成。而这次我们读的是早期写本，约在6世纪，用的是我完

全不熟悉的吉尔吉特-巴米扬字体。我先自学字体，然后试着释读，一开始总是如读天书般费力，熟悉了字体和经文内容之后，进度会略快一些。我们上课的时候轮流汇报自己的转写与翻译，常常为一个字符的确认，一句话的翻译推敲良久。当然我在课下准备的时间更长，课前至少要花五六个小时，有时遇到难以辨认的字符，苦思冥想，多方查证几个小时却无法可解。也有灵光一现，豁然开朗的时刻。就像一首佛教偈子里说的：“我有灵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一朝尘破光生，照遍山河万朵。”

在我埋头研读千年前的写本时，我的导师也在新疆破解千年前甃甃上的图案。我们的工作繁杂，寂寞也清苦，但正如我的导师所说，我们是文明的解码者、传承人，我们长夜孤灯，寂寞坚守，就是为了把这个学问传承下去。

我也和何离巽教授谈过专业的选择。他本科读中文，硕士和博士读印度学和佛教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大乘文献和早期汉译佛经。他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我只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因为是自己的兴趣，所以会不断学习新的语言和技能，会不断挑战高难度的领域，会不断提出新观点，打破原有的成见。而这个选择无关名利，只是心之所向。

四方院中有一组人像雕塑，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代表作之一——《加莱义民》。起初我看到这些人衣服破烂，弯腰低头，身上还有绳索，还以为这是纪念修建铁路的华工雕塑。斯坦福大学的捐赠者老利兰·斯坦福当年所办的铁路公司承建了贯通美国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太平洋铁路在修建过程中雇用了大量华工，华工们吃苦耐劳，而且因为工程艰难，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太平洋铁路简直就是华工的血汗铺就的。老利兰·斯坦福从太平洋铁路中赚取了巨额财富，而斯坦福大学就来自于这些财富的一部分。斯坦福威名赫赫，而背后的华工却寂寂无名。直到近些年美国才有华裔学者对此开展研究，并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了华工与太平洋铁路的展览，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让更多在美华人了解了华工曾经的苦难和伟大。

除了东亚馆之外，另一个我常去的图书馆就是四方院对面的格林图书馆，也是斯坦福的主图书馆。它的藏书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一层有一个阅览区，紫色的丝绒沙发下是厚实的地毯，周围的书架放满了世界各国的主要报纸。在这里读报就像坐在咖啡馆里一样。我最喜欢去的是三楼的书库，里面有好几排是印度学和佛教学的藏书。我可以轻抚十九世纪旧书的书脊，可以摩挲老式精装书封面的烫金花字，也可以翻看已成绝版的印度

学前辈的文集。在满室的书香里我甘愿做一条书虫。

最后我想说说斯坦福久负盛名的博物馆和罗丹雕塑园。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到博物馆总是特别关注佛教造像和印度艺术品。这里的佛教造像虽然不多，但不乏珍品。其中一尊公元2世纪左右的犍陀罗佛头异常精美，让我驻足良久。犍陀罗地区位于古代印度西北部，公元前曾被希腊人占领过，建立了希腊化的王国。希腊人统治期间，佛教传播到这一地区，他们的国王皈依了佛教，有一部佛经《弥勒王问经》的主角就是这位国王。因此，这一地区的造像风格深受古希腊艺术的影响，从佛陀的卷发和面部立体的轮廓都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像的痕迹。这尊佛头也是如此，眉目深邃，鼻梁高挺，作闭目沉思状，神态沉静、安详。神奇的是看久了总觉得他在微笑。怪不得北大办的犍陀罗佛像展览叫“犍陀罗的微笑”，这才是神秘的微笑啊！还有一尊中国明代的金漆木雕菩萨，也是木雕佛像中的上乘之作。菩萨面容秀美，眉目间饱含悲悯之色。佛像雕工极为细致，花冠、衣纹和璎珞都精巧且灵动。除了佛像，还有中国的玉器，古埃及的木乃伊和古希腊的陶罐，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在博物馆外的雕塑园，可以看到罗丹的代表作《地狱之门》。它取材于但丁的《神曲》，里面雕刻的人物都是《神曲·地狱篇》里的。顶端是三个靠在一起的人像，手臂都指向下方的门，代表三个有罪的灵魂为罪人指路。门楣中间就是《思想者》，象征作者但丁。在他两侧是一些轻罪的人，而在下方则是重罪之人。那些重罪人扭曲、挣扎的姿态，惊恐和畏惧的神情仿佛让人能听到他们的哀号，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传说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地狱变》，描摹地狱中恶鬼所受的种种酷刑太过生动，以至于长安市集上屠户和渔夫都心生恐惧，不再杀生了。看来中外古今，艺术家的传神妙笔都是共通的。

在我离开斯坦福之前，我和研究中心的师生们聚餐。其间我们谈起近年来欧美各国对人文学科的削减，对未来人文学科的发展颇有些忧心。柯家豪 (John Kieschnick) 教授调侃说也许再过几年我们的中心也要改成“佛教与计算机”，或者“佛教与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了。大家哈哈笑过后，看着满座朝气蓬勃的学生，何离巽教授说道，只要我们还有学生，我们还能自由地思考与研究，我们的学问就能传承下去。颇有几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味道。这几年来我在学术研究中遇到困难，几近失落时，也常想起在斯坦福读书、讨论写本的日子，想起教授们的话，心中便有了几分释然，有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与坚定。



## 笔会

文明之光系列二 (油画) 龚安

居家时间越久越想念在路上的日子。实在憋闷了就翻出那一厚沓子带着各式邮票和邮戳的明信片挨个捋一遍，不由分说，过去的时光就扑面而来。那是路上的我寄给在家的我的信函，那个疲惫但张着好奇兴奋的眼睛、怀着“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窃喜心情的我写给疲惫忙碌又不免沮丧的我的文字。遥远的那个人殷殷告诫眼前这个人要平静，感觉辛苦的时候就想一想路上的人物风景故事，或许可以一晌贪欢。现在的我要对那时的我说一声谢谢。

翻看的次数多了，以上那些矫情的自我伤感慢慢退却了，明信片背面那一枚枚小小邮票越来越吸引我的目光。不由得做了个小小研究和对比，路上那些与邮票邮递有关的小故事也一一蹦跳出来……

寄一张明信片，除了这张片片本身，还需要邮票以及邮筒。很多时候更需要找到邮局。最方便的时候就是卖明信片的小店同时出售国际邮票，邮筒就在门外或不远处，这算运气超好了。如果同时出售明信片和邮票，那也不差，实在找不到邮筒或邮局，可以托付给酒店前台，他们一般都很愿意帮忙。只买到光秃秃明信片是最差情景了。背着大书包在异国他乡很快找到邮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极端情况下都已经到机场了，背面已经写满文字的明信片还在自己手里。不行，没盖邮戳没飞行一趟的片片价值索然。只能碰运气了，打听好国际邮票的价格，然后将现金如数留给机场工作人员，请求帮忙。这种最差情景并不多，而且几乎都不会失望，一段时间后会收到邮筒。

唯独一次耿耿于怀。那是在巴西，一路上已经寄了不少片片，给朋友给人自己，最后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张——那是一株几个成年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热带雨林大树，我特意留给自己——砸在手里，都到里约机场出海关了还差邮票这个要件。正发

愁，一个年轻女孩子拿了一张调查问卷请旅客填写，我认真地填写完，顺势请女孩子出去后帮我寄一下并留下足额邮资(3雷亚尔，一般最多2.7雷)。可惜我再没有见到这张明信片。

在邮票的发源地英国买邮票最方便，每个小摊和超市都兼售邮票。我特别推荐摊主，我要的是国际邮票，to China(到中国)，花臂大哥一边准备邮票，一边朗朗地回答：to everywhere (到哪都是它)！我一下子笑起来。原来英国的国际平信邮票只有一种，到对岸的法国和到东亚的中国邮票相同，0.78英镑，与当地物价水平比一点也不贵，但按当时的汇率算感觉不便宜——那还是一个“胖子”(Pound，英镑)换15元人民币的时代。

这些年过去了，英国的邮资一定涨了，反正欧洲大陆国家邮资见涨。2014年，在巴黎寄回国内一张片片需要0.98欧元，到2020年春节已然是1.4欧元了，当时法国还发行了意趣盎然的鼠年首日封——那是疫情前的最后一次国际旅行了。德国的便宜一些，从当初的0.75欧元涨到疫情前的0.90欧元。在欧洲那么多国家中，邮资最贵的当属意大利，要2.5欧元！不过摊主也絮絮叨叨地解释：这种邮票上有二维码，允许你时时跟踪邮路进展，而且信箱我这小摊上就有，你要愿意去邮局买邮票能便宜30欧分……我只能认了。从梵蒂冈——位于罗马的“国中国”——寄信也需要2欧元。反

而卢森堡这样的高物价国家，只要1.1欧元，芬兰也还可以，1.5欧元。最便宜的也不是德国，大概算希腊，只需要0.67欧元(2015年)，可能是为了鼓励旅游业发展吧。当年我们三家人一起在希腊旅行，看邮资便宜，我们一路买买寄寄寄，奇怪的是我家的后来都收到了，朋友家的一张没收到，真没地儿讲理去。马耳他这个地中海第九小国，邮资却不唯一，从0.63到0.77欧元不等，也是莫名其妙。非欧元区的可能性就差一些了，瑞典大约需要15瑞典克朗，瑞士是2瑞士法郎，丹麦要9个丹麦克朗，波兰5个兹罗提，而捷克是21捷克克朗……从这形形色色的货币单位中不难看出欧洲民族国家林立的复杂性、欧洲经济共同体推进的难度。

我碰到的邮资最便宜的地方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中的一员，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市政网络还没建好，邮局里能看到一个个带编号的小柜子，都是为有需要的市民开设的信箱，通信往来需要市民到邮局自取自送。看这情景，感觉邮资一定不会便宜。没想到，没想到，往北京寄一张明信片只需要6.6比尔(Birr)！我和同事们快速地算了一下，连一块人民币都不到啊！我们都惊呆了，再三确认，没问题，就是6.6比尔。就这点邮资，不寄白不寄，就算走水路，三个月之后到达也值了。于是，我们现场打电话向

小黑

亲朋好友要地址，兴奋地停不下来。两个星期之后，明信片纷纷各归其主了，人家是坐飞机过来的！

这次美好体验也给我埋了坑。那年在马拉喀什，买好了片片，找到德加马广场邮局买邮票。一番比划和沟通之后，我以为只需要一张邮票——9个迪拉姆——即可，盘算了一下，不算贵。埃国经验浮上心头，一边感叹不发发达国家也有好处，一边翻出手机通讯录，能寄的都寄。几天之后，跟同事一对比，才发现我错了，国际邮资需要两张邮票，也就是18迪拉姆，国内邮资才是9迪拉姆。问题是我已经得意洋洋地和朋友们广而告之了，叫他们坐等来自摩洛哥的明信片，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如数重新购买并邮寄。下决心要多学两句阿拉伯语。

在巴以地区也有类似经历。都说耶路撒冷物价贵，名不虚传，明信片贵，邮资更贵，要7.4谢(Sheqel)，按当时汇率算相当于13.5元。我小心谨慎地寄了几张，给自己给女儿给闺蜜。等到了伯利恒(属于巴勒斯坦管辖地带)，参观完圣诞教堂找到马槽广场邮局买邮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张明信片只需要1.5谢(大约250米尔，巴本地货币)。我以为又听错了，再三确认——我要寄到中国，中国，中国，没错，就是1.5谢！我又一次惊喜得满眼放光，冲回街上又买了几张，返回邮局。之后还感觉不过瘾，又出去一趟再返回。三进三出伯利恒邮局，工作

人员也很开心，一见我就笑。不过他们也说了，这里的邮票只供巴勒斯坦地区使用，到了以色列那边就是废纸一张了。在邮局墙壁上张贴着联合国为该地区邮政系统提供支持的信息，想来这么便宜的邮资应该是有补贴的，目的是与耶路撒冷争夺一点客源吧。还可以举个例子，同样一本耶路撒冷旅游书籍，在耶城要60谢，而在伯利恒只要36谢，两地相距不过几十公里。顿悟了这个巨大的差距后，我在伯利恒购买了大部分计划中的伴手礼。

再次见到伊朗和印度尼西亚邮票，依然被巨大的面值吓到。从伊朗到北京明信片邮资是30,000里亚尔(Rial)，按汇率算大约5-6元人民币。里亚尔实在太不值钱了，连伊朗人都觉得不方便，在民间交易又形成了名为“土曼”(Toman)的货币单位，1个土曼=10个里亚尔。所以在自由市场询价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对方说的是哪个单位，不小心可要后悔的。从巴厘岛到北京需要10,000卢比，大约5元人民币左右。印尼常用到的纸钞面值是1万和10万卢比，稍一眼花就要出错，因此每次付钱的时候都认真地数“0”的个数，不胜其烦。记得刚落地巴厘岛机场，由于在新加坡机场转机匆忙，行李没有一起到达，航空公司立刻进行了赔付。拿着几十万印尼卢比，我心花怒放，其实也就20多美元。

# 方寸世界里的远方

说起货币的贬值，津巴布韦首屈一指。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津国的邮票没有面值，记得是1美元左右——美元在该国是硬通货，而往日的津国纸钞被当成商品出售：10亿元的纸钞卖1美元，100亿元的5美元，等等，而我有幸买到了一张10万亿的(1后面有13个“0”)，20美元。

大家的邮资都在涨，只有日本例外：2004年还需要120日元呢(筑波)，2017年只需要70日元(东京)，也属于便宜之列了。北美呢，美国大约1.05美元，加拿大就贵了，要2.5加元(美元加元汇率大体1:1)；大洋洲的澳大利亚，2010年只需要1.4澳元(悉尼)，2018年便是2.3澳元(凯恩斯)，新西兰要1.9新西兰元……有一张发自德国的明信片居然先去台湾转了一圈才飞回我手里，耗时多了一倍；有些明信片上的文字我早就读不懂了，因为那是我请当地导游先生写的，就看看他们的文字长什么样；有些片片上满满当当挤着各种花式手迹，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那是我请同组的国际专家一并写上的，纪念我们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

这以百张计的明信片，抚慰和疗愈着现在，梦想远方的心蠢蠢欲动。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